

# 作家和作品

## 香港的文学“易”代：从王韬到张爱玲

吕文翠

内容提要：两位文坛重量级的人物——王韬与张爱玲——均曾与香港结下不解之缘，他们香港阶段的文学成果都带有某种香江经验。本文以“易”为核心母题，从王韬因应变局而作的政论呈显其欲建构“大我”家国历史叙述为始，继之探究张爱玲自承挖掘阴柔“小我”面相而远离大叙述所带出的文化省思，追索王韬、张爱玲个人的命运的穷通如何呼应着历史，揭示其“小我”与“大我”的对照不仅展开了一场百年阴阳变易的历史辩证，更为近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现代性转型留下重要见证。

关键词：王韬 张爱玲 香港 易经 文化转型

DOI:10.16287/j.cnki.cn11-2589/i.2015.05.010

自从1840年代，士大夫致力赓续王朝、经纬天下的精神与知识结构产生了巨大变易，现代知识分子先驱王韬（1828—1897）在香港（特别是他1870年代从英国返回以后）的文字书写，就充满危机意识与变革精神，他的文化活动已经成为近代历史的有机成分。越七十年而后，香港战事中的经历，供给张爱玲回到上海、逾越大洋以后隐喻历史的“不相干”琐细经验，她直接给小说命名《易经》（*The Book of Change*）。王韬纵览天下时局而作的政论，屡屡诉求“‘穷则变，变则通’，此君子所以自强不息也”<sup>①</sup>，自承君子的阳刚“大我”，其于历史的责任感沛然充溢于字里行间；张爱玲的阴柔“小我”则心甘情愿地远离历史大叙

本论文乃台湾“科技部”专题研究计划“才子、笔政、通人：晚清民初‘海上’知社群的思想特征与文化实践”（计划编号：NSC102-2410-H-008-072-MY2）之部分研究成果。

述。王韬、张爱玲个人的命运的穷通仍然呼应着历史，“小我”与“大我”的对照论述展开了一场百年阴阳变易的历史辩证。“从王韬到张爱玲”的题旨在于这一辩证，并不专为提示某一文学史脉络。以香港为依托的现代“易”经，索解此类人事与文字中包孕的现代性，价值不下于传统正典义涵。

### 一 “才子”与“国是”的穷通

若不是遁迹香港，王韬仍然是一个为稻粱谋的沪上才子。朝廷科场久不售，别寻路径上书太平天国，而被谗封“长毛状元”，王韬被朝廷通缉。此后，他的生命历程渐如晚年名帖标示：“天南遁叟、淞北逸民、欧西经师、日东诗祖、书读十年、路行万里、身历四代、足遍三洲。”没落才子王韬离开上海，数年后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他走过了一段个人的由“穷”而“通”道路，其间之“易数”主要来自于他的世界行旅。他的“通”途，完全不依赖于朝廷，却是依赖知识的跨文化融通、对当代世界的把握，其主体显示则最大地依赖于他参与创办和主持的现代报刊。

王韬作为近代中国的重要思想家与“现代”报人，其相关研究几汗牛充栋，在此仍需简述其沟通“海上”<sup>②</sup>文化的功绩，凸显王氏积极有为的“香港时期”的特殊意义。他甫逾弱冠（22岁）即至上海协助传教士佐译《圣经》，同治元年（1862）因卷入献策上书太平天国军的通敌疑云而遭清廷通缉，遂出逃至香港，易名韬，自号天南遁叟。在港期间，助香港英华书院（Ying Wa College，旧称Anglo-Chinese College）院长理雅各布（James Legge，1815—1897）翻译中国经典为英文。1867年理氏回英，临行之际邀王韬“往游泰西，佐辑群书”<sup>③</sup>。是年冬，王韬从香港去理雅各布故乡苏格兰佐译群经，1870年春随理氏回到香港，两年有余两人共译出《礼记》《书经》《诗经》《春秋》与《易经》。与此前上海阶段将《圣经》译为中文相异的是，香港时期的王韬扮演了将十三经“译”为西文《中国经典》（*Chinese Classics*）五巨册并在泰西世界广为流通的主要角色。这奠定了理雅各布成为英国牛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首席，更象征了晚清中国东西文化与思想深度交流、互动所镕铸的心血。

自欧土返港不久，王韬震惊于欧陆强国法国在刚刚结束的普法战争中竟至一蹶不振，更有感此战争对世界局势投下的巨大变数，遂与张芝轩合作辑译西文日报的战争消息，编撰出版《普法战纪》（1874），风行一时。同治十三年（1874），王韬任第一份由华人创办、全权负责的报纸《循环日报》（*Universal Circulating Herald*）主笔。报名“循环”寓“天道循环，自强不息”之意。他在报上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传播改革观念，在晚清第一代报人中声名最为显赫。

《循环日报》是王韬展现自强不息精神的阵地，其见识通达、雄视寰宇的精神气度较当年逋逃客的天南遁叟，其“穷、通”不可同日而语。

甫自上海亡命香港的王韬，面对新的生活环境，号位于鸭巴甸街（Aberdeen Street）的寓所曰“天南遁窟”，欲潜匿韬晦，不复问世。他易“瀚”名为“韬”，以贬谪流徙自况，香江风物触目皆悲：“我初来时厌此土性恶，常畏烦热委顿病泄呕。瘦妻娇女啼哭思旧土，一家四人卧床无一瘳。半椽矮屋月费半万钱，风逼爨烟入户难启眸”<sup>④</sup>。追悔自咎萦绕心怀：“已知成弃物，何得尚谈兵？杀贼雄心在，还乡噩梦惊”<sup>⑤</sup>。

王韬的“穷通之变”并非旧小说中的时来运转，亦不恃一己之力单打独斗，其成就源于和报界同仁共力合作。他与当地报刊界华人知识菁英颇为契合，如：曾赴美就学、后担任上海广方言馆英文教席的黄胜（字平甫），在港创办最早中文报纸《华字日报》的陈蔼廷<sup>⑥</sup>，西文日报主笔张宗良（字芝轩），广东仕绅名流如容闳、邹诚（字梦南）、何玉祥、梅籍、陈桂士等。王韬在香港创办中文日报与编译泰西史志每得力于他们，这表明在香港已经有一种现代知识界的力量形成，他们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此一阶层中的王韬，与西方世界深度接触而获致真正的了解，与此前在沪权宜供职西人教会组织机构，心态有本质差异。

光绪五年（1879）王韬52岁，《普法战纪》享誉东亚，乃受邀赴东瀛，游历东京周遭四月余，密切往来日本报刊界新旧派知识分子。东京两大日报《邮便报知新闻》《朝野新闻》纷载其诗文，汉文期刊《明治诗文》也收录王韬曾发表在香港报纸上的文章。他的作品继上海报刊界频频在日本新闻业与文化界亮相，突破了国界及语言的限制，东京文坛俨然成为他汉土之外的另一座展演舞台。居停百廿余日行将回港前，他将期间写下的日记《扶桑游记》三卷交由东京三大报社之一“报知新闻社”出版。该书因香港、上海发达的出版与流通而影响久远，深助于晚清开明文士了解日本明治维新文化社会状况。

王韬在港二十三年（1862—1884），占成年生命时光近半，且当35至57岁盛年，思维活跃、体力精神堪称巅峰，此阶段王氏俨然报界元亨：创办中文报《循环日报》并担任主笔，主持印书局（中华印务总局），与上海报刊界声息相通，执上海报界牛耳的《申报》经常转载其诗文，报馆出版社亦屡屡代售其著作。

此一时期，王韬在《循环日报》为变法强国制造舆论，开“文人论政”风气，不再是士大夫身在江湖，心存魏阙的方式。王韬为文，立场鲜明，短小精悍，富于感情而易读，后来发展成为一种报章文体，对后起的维新派报人影响深远。王韬报纸上的文章收入《弢园文录外编》（1883），为第一部报章政论文集。

其政论经纬，核心不外一个“易”。之所以要变易，乃因国运之“穷”，观欧洲之“通”，必要改弦易辙。所以，他在《变法》中呼吁：

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知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呜呼！至今日而欲辨天下事，必自欧洲始！以欧洲诸大国，为富强之纲领，制作之枢纽。舍此，无以师其长而成一变之道。……然而一变之道难矣。以今日西国之所有，彼悍然不顾者，皆视以为不屑者也。其言曰：我用我法以治天下，自有圣人之道在，不知道贵乎因时制宜而已。即使孔子而生乎今日，其断不拘泥古昔，而不为变通，有可知也。今观中国之所长者无他，曰：因循也，苟且也，蒙蔽也，粉饰也，贪罔也，虚骄也；喜贡谀而恶直言，好货财而彼此交征利。其有深思远虑矫然出众者，则必摈不见用。苟以一变之说进，其不哗然逐之者几希！……<sup>⑦</sup>

王韬对中国变革的艰难亦估计充分，深明“易”“国是”之不易。在个人穷通变易之外关心国运之穷通，是王韬香港笔墨之焦点，这些文字的背后是一个以王韬为代表的晚清知识分子的阳刚“大我”。

## 二 “海上回廊”与东亚文化联系之“易”

在港完成的《普法战纪》是王氏吸纳欧洲经验后的文化产物，《扶桑游记》则为晚清第一批“东游日记”中之佼佼者，微妙地呈现了上海、香港、东京三地间存在着一条“文化回廊”，标志着王韬作为十九世纪末叶东亚汉文化圈的“触媒”人物，以报刊为中心催发了三城间活跃能量的“化合”。这种都市报刊知识界的文化联系成了一个稳固的三角，又遥遥呼应着欧美文化而变易。香港因与欧洲联系更形密切而地位特殊，三城纽带已动摇了中原文化的中心地位。

以香港岁月为界，王韬此前十三年的上海经验为其一生事业的“奠基期”，那时他每与友人李善兰、蒋敦复等自命为“海上三狂士”，郁郁不平而“风流逃酒”。若非情势所逼而仓皇出逃，应在上海租界区佐译西人，相对安逸地度过一生，堪为第一代“洋场才子”典型。惟因遁迹香江，改名为韬，以此为据点走出国境，先是周游欧陆各国，继而泛舟东瀛，涉足扶桑关东关西等地名城，方成为晚清中国士人阶层中，非循仕途出身奉使出洋，却能具备泰西与东瀛实际生活经验的先驱者之一。因此也可以说，结束扶桑之旅再次回到香港，王韬才在传统才子与名士格例外，成为具有现代知识结构的一代魁儒。

王韬返程别具深义，乘船赋别东瀛，离东京至大阪、转神户循原路返，再度造访来时香港旧识张芝轩。张毕业自香港“保罗书院”（今圣保罗书院），深通西学，英语畅达，《普法战纪》新闻入史的崭新撰著模式，大抵辑纂自张实时译

出的西文报章最新消息，香港元素可谓《普法战纪》不可或缺者；在神户启程搭轮船回沪，同舟者有亦受日本大藏大辅松方正义之邀东游而返的香港总督燕泉斯（John Pope Hennessy, 1834—1891，今译为轩尼诗），<sup>⑧</sup>故人相聚欢然，舟行经长崎离日本，转道上海拜访创办轮船招商局总理唐景星、徐润。也可以说，香港故交旧识身影“自始至终”陪伴在王韬往返东瀛的旅途中，再次象征了东亚三城中香港名流扮演的关键角色。

香港不啻为王韬生命逆旅中最具特殊意义的中继站，缺此转折点，其生命风景势必迥异。香港生活固以看似被甩出既定轨道的厄运为起点，但非经此千百折的劫难所淬炼，亦断断无法成为一颗近代东亚动荡历史中光芒耀眼的彗星。涉足欧土、日本的这两趟泛海东西洋的旅程，非但是王韬个人生命史上的不凡体验，从十九世纪末叶东西文化折冲融汇的角度来看，饶具象征意义。

更进一步来说，王韬香江东瀛往返，凸显其作为十九世纪末叶东亚汉文化圈的“触媒”作用，亦为进入上海、香港、东京间这条“文化回廊”之枢纽；这三座吸纳西方文明的东亚城市中盛行的报刊传媒，更是我们从横向地理与历史纵深理解世变中的东亚知识菁英如何面对当前文化课题的重要管道。王韬其人其文游走流通于三城知识菁英群体间激起的质诘辩难与切磋交锋，无形中体现其游走边缘并囊括八方的特性，复揭示出此东亚三城共同因应西方冲击而衍生复杂多元对应策略的思想底蕴。

如果说蕴含东方深刻智慧的《易经》以一套兼具符号与文字系统来描述事物变化，表现了中国古典文化的哲学和宇宙观，那么，香港阶段的王韬，得《易经》穷通变化启迪的思想演变与廿三年生命历程，则写就了一部“变易之书”，成就了近代史上一个文化巨人的身姿。

### 三 张腔《易经》：“不相干”的“小我”叙述

一个晚清才子加现代知识分子（王韬一代人的多面向）的香港《易经》写完了，一个民国女子的香港《易经》在二次大战后十多年在美国产生了。张爱玲（1920—1995）与王韬的历史变易的叙述大相径庭，她有特殊的“张腔”，“不相干”的“小我”是她的着眼点，历史缝隙中的“生趣”是她的原则。不同时段的男女的香港经历的阳刚阴柔，成就了两段“易”经。

1939年夏，英国伦敦大学在上海举行入学考试，在包括日本、香港、菲律宾、马来西亚等整个远东区的考生中，自美国教会创办的圣玛莉亚女校毕业的张爱玲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但因为二战原因不克赴英留学，持成绩单改入香港大学。戎马倥偬的动乱局势让张爱玲进入英国殖民地就读大学，这是她人生中第一

个香港时期（1939—1941）。

这段经历，在张爱玲的两卷本长篇英文小说《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与《易经》（*The Book of Change*）尚未“出土”之前（2010年出版），读者早就能在她小说中的香港故事（《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连环套》），或上海香港双城故事（《倾城之恋》）中拼凑出断片印象。珍珠港事变后，香港惨遭日军轰炸，在港大苦读三年、成绩优异的张爱玲本来很有希望得到牛津大学奖学金赴英深造，无情的战火烧毁一切就学成绩与记录，无奈之余只得再度回到沦陷日占的上海。

过去被视为她文学创作减产的1957—1964年间，张爱玲其实正撰写长篇英文小说。她与宋淇夫妇通信中坦承其题材并不新鲜：“（上半部《雷峰塔倒了》）看过我的散文《私语》的人，情节一望即知……下半部叫《易经》，港战部分也在另一篇散文里写过，也同样没有罗曼斯。……”<sup>⑨</sup>，均取材于本人的半生经历。“张迷”应知此散文即为《烬余录》<sup>⑩</sup>：《易经》的缩小版原型。

《烬余录》开篇在忆往语调中传达一种特异的历史叙述之“不相干”哲学：

我与香港之间已经隔了相当的距离了——几千里路，两年，新的事，新的人。战时香港所见所闻，唯其因为它对我有切身的、剧烈的影响，当时我是无从说起的。现在呢，定下心来了，至少提到的时候不至于语无伦次。然而香港之战予我的印象几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干的事。

我没有写历史的志愿，也没有资格评论史家应持何种态度，可是私下里总希望他们多说点不相干的话。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在那不可解的喧嚣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刹那，听得出音乐的调子，但立刻又被重重黑暗上拥来，淹没了那点了解。画家、文人、作曲家将零星的、凑巧发现的和谐联系起来，造成艺术上的完整性。历史如果过于注重艺术上的完整性，便成为小说了。像韦尔斯的《历史大纲》，所以不能跻于正史之列，便是因为它太合理化了一点，自始至终记述的是小我与大我的斗争。

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总未免使人厌烦。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sup>⑪</sup>

这段自明心迹的陈述，饶有1970年代以降流行一时的新历史主义的意味，谓：“历史充满断层，历史由论述构成，历史并非对史实单一的纪载”。张爱玲就读香港大学时期遭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大举轰炸香港的战火追忆（1939—1941），俨然与历史“大叙述”泾渭分明。<sup>⑫</sup>这段于“小我”刻骨铭心的战乱余生录，始终在张爱玲的作品中萦绕不去，成为现代中国小说史上人人耳熟能详的

文学“正典(典故)”。

不同于王韬构成晚清中国史的政论,张爱玲主要在小说中以“不相干”琐屑事实隐喻历史。在港战后回到上海沦陷区,她虽曾在圣约翰大学继续未完学业,不久却因经济困窘而辍学,生计问题使她朝着职业作家一途努力。她已算不得文坛新手,曾有多篇英文散文刊于上海稿酬丰厚的《二十世纪》(*The 20th Century*)。在1943年初到年底间,张爱玲发表了九篇洋洋洒洒的长文及与小品文影评,颇受德籍编辑克劳斯·梅奈特(Klaus Mehnert)赏识。但在华文艺文圈中,她仍属籍籍无名之辈。接下来是张迷熟知的典故:她提着“两炉香”拜访主编周瘦鹃,在复刊后的《紫罗兰》上分五期连载,从而成为上海文坛耀眼新星。<sup>⑬</sup>张爱玲正是靠着三篇一系列中文写就的香港故事(《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刊登在《杂志》月刊的《茉莉香片》)在沪城文艺圈一举成名,其丰沛的创作能量一泻千里,迅速成为沪地文坛个中佼佼<sup>⑭</sup>。这三篇小说初试啼声而一鸣惊人,命名均有“香”字不是偶然,乃作者有意为之。

从创作编年史看,学界一般认定为张爱玲炉火纯青的短篇小说力作——1979年发表于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的《色,戒》——主角美艳间谍王佳芝即是在香港岭南大学就读时被吸收为抗战地下情报人员,此乃继《倾城之恋》后张爱玲上海/香港双城故事又一巅峰。甚至英文长篇小说《易经》(中文译本同步推出),作为最后出版的张爱玲小说的双语著作,诉说的正是小说女主人翁沈琵琶从上海负笈香港大学后遭遇港战洗礼,身心状态于焉正式历经“成年礼”仪式。总结来看,香港魅影可谓在张氏创作生涯中徘徊不去,屡经多重演绎,看似变貌迭生,实则仍根植于家族/自我(小我)的生命体验。

#### 四 轶/逸/易经:世俗/世故/世变

《烬余录》文末进一步颠覆大时代叙述与个人之间的关系: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

沦陷区以外的抗战作为一个“大时代”展示,张爱玲个人化的港战生涯却只当作一个橱窗呈现: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并没有什么统一的意识把人们联系在一起,让人们在心理上夸大群体化、民族化效应,以达到忘记个人的渺小与空虚。战时的

香港是一部变异之书（A Book of Change），但是张爱玲强调的是一些“世俗”生活中人际关系的小小变化，她以“世故”态度去应对世界大战的“世变”。

《易经》的篇章结构至少表明某种“不相干”：前五章仍接续《雷峰塔》，着重描述少女琵琶逃出父亲家的囚禁，结束童年岁月，投奔母亲，和姑姑三人同住上海公寓大厦的琐屑生活。香港对日战争完全不是一个决定结构的大事件。在世界范围的战争之世变中，张爱玲不忘穿插与父系及母系的女性长辈家常闲话的日子，琐言碎语间亦不时掺杂着家史轶闻的层层揭秘：舅舅杨国柱是抱来的；浓眉大眼的弟弟沈陵可能是母亲杨露与“教唱歌的意大利人”的骨肉，因此长得“不像中国人”；而姑姑沈珊瑚则与表侄儿罗明有了乱伦恋情，甚至为资助罗明营救他深陷贪污案的父亲而挪用杨露的半生积蓄，让一向亲密的姑嫂因财务问题起了勃谿。也许，这种穿插才是张爱玲的价值——“世变”中的处变不惊，“世故”眼中常态的“世俗”生活。

从《烬余录》到《易经》再至《小团圆》，港战期间的生活被张爱玲一再重写，然而从未有过“大我”的叙述。她以人物（沈琵琶、盛九莉）的“小我”为基点，藉由与大叙述“不相干”的事情表现“生趣”。这个生趣并未得到张爱玲的进一步阐释，从她的小说人情表达效果来看，生趣在于：最切近的人际关系生发的纠葛中往往更多向度地折射出人性的隐微曲折。

占《易经》全书三分之二强的香港战时生活经验，有许多情节如沈琵琶从大学资优生成为轰炸空袭中的幸存者、围城中的饥民、沦陷区教会中临时充任志工与战时医院看护伤员的护士，都可以在散文《烬余录》与小说《倾城之恋》找到线索，最终能让琵琶在战后失序混乱的局面中买到船票顺利偕同闺蜜比比逃离香港，竟得自她威胁医院的主事者莫医生，要将他深夜偷运日军物资获致暴利的行径向日军总部密告。如果不是从道德上判断，行此险招也说明了琵琶拼了命也要回到上海的决心。小说收束于琵琶的意外发现：竟与持抗日立场的京剧名伶梅兰芳同船。琵琶深怕轮船被炸沉，梅兰芳则如人质，是日军或能保障航行安全的重要筹码。在窃喜心境中，轮船缓缓绕过台湾，在古名鸡笼的基隆港外停泊，来到祖父于晚清中法战役中败走之地，令人有历史轮回之感。她下船回到上海，在阳光照耀下乘黄包车奔赴姑姑公寓，好像不曾经历过战争一样。

《小团圆》前半部多处情节结构几近《雷峰塔》与《易经》重要桥段的浓缩版：如《小团圆》九莉与母亲蕊秋间的爱恨情结，应了张爱玲所谓“所有的女人都同行”的话，同行相忌而母女亦不例外。在《易经》中已届青春期的琵琶与母亲杨露间战争的白热化，乃是杨露在牌桌上一夕之间输了女儿的奖学金（八百元）后正式爆发，症结是杨露断定这笔款子是大学历史教授布雷斯代（《小团



圆》中名为安竹斯)付给琵琶的一笔夜度资,终于彻底摧毁琵琶对母亲的爱。

在一场巨大的战争中,将叙事的焦点放在一笔“钱”上,获奖之数与赌桌上输钱数目恰好相等,简直如明代话本“十五贯”故事之复制,可叹进入世俗之深。再从这种俗事中俯视母女情感的张力空间,那是一副世故老到的眼光与姿态。无视身边的世界大战,专就身边琐事做文章,这不由地要想到张爱玲似乎在遥应梁实秋们的“与抗战无关”。

张爱玲只是将世界大战作为个人生活中的一段经验过程,根本不存企盼要在战火中获取个人乃至民族国家的新生。她的人心/人性危机感远强于国家民族。

《易经》中的杨露(《小团圆》中的蕊秋)来去香港,表面上只是一次出游,内里却是一场情感征逐的游戏,而游戏的目标往往与她生活的经济依靠联系,这又与她从不太青春年少时留洋过程中的追求一以贯之。一个处处精打细算又受过西洋教育的母亲,其实只是另一个喝过洋墨水的曹七巧,她始终在九莉耳边聒噪为她花了多少钱。以至于九莉在战争中最大的心愿是有朝一日能还清她母亲为她的教育投资。九莉在浅水湾送走母亲,不无讶异地观察到她竟然随身携带十数件行李。这“不相干”的行李所藏是她的箱底,直到她死后才揭开谜底。《小团圆》中叙述嗣后蕊秋又从上海出行,仍是随身携带十几件行李。最终她死在欧洲,报纸载拍卖其遗物的消息,最值钱的是一对不知何朝代的玉瓶。杨露/蕊秋毕生进行着没有家乡的奥德赛之旅,她教给女儿的行为能力的遗产是如何装行李箱。

古董花瓶的“轶事”,蕊秋交接种种不同国籍的男朋友的“逸事”,这一切都无关宏旨,都是些“不相干”的琐事。花瓶只是不虞之计,有那么一天断了男人们的贴补,它就是果腹保暖的依靠。一个日渐老去的女人的无穷无尽的行旅,从一地到另一地,从一个男人的臂弯到另一个男人的怀抱,一个接着一个的“易人/易地”,到死为止。她在母女关系上,围绕这“钱”处理得那样世俗,她看钱主宰的人际关系那样地世故,以至于世故地对待足以震动世界的战争“世变”。现代中国文学中,有若干个作家会写战争中的国家民族大叙述,也有若干个王韬那样的知识界人士,在危机感的驱动下写出种种政论和历史叙述,只有一个张爱玲会在战事进行的过程中提出重视那些“不相干”,因为她相信战争不能带来“生趣”,真正有趣的是人情百态。张爱玲从第一炉香开始,就写这种生趣,到《小团圆》而登峰造极。

非常遗憾的是,人们总是乐此不疲地将它作为自传看。然而就如同张爱玲在1960年代左右对《红楼梦》进行的考评,对并无大波澜的前八十回情节中最扣人心弦,亦对宝玉打击甚深的晴雯之死,花费许多篇幅进行阐释,力主“是创作不是自传”一说,反驳自1920年代“新红学”主张《红楼梦》为曹雪芹家史自叙而风行一

时的“自传说”<sup>⑮</sup>一样，众多张迷早就习惯将这三部小说与张爱玲十八岁（1938）那年发表在上海《大美晚报》（*Evening Post*）上的“*What a Life! What a Girl's Life!*”英文自传体散文及中文改写的《童言无忌》《私语》，太平洋战争时期的香港经验《烬余录》，以及《对照记》相互参详对照、中英对译。迄今为止，张爱玲生前未能出版的小说大抵仍被视为张之“自传”，用以佐证（认证）她的小说人物塑模脱胎的原型，罕有人将它们当成纯粹的文学“创作”来看。<sup>⑯</sup>

智勇双全地买到船票、与梅同船及航行过台湾的情节或许是太过传奇化，这些细节在1976年撰成的《小团圆》中虽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仍带给我们全面评估张爱玲小说创作中“香港成分”的重要契机，已逾不惑知命之年的小说家未尝不是再度回应早年在《烬余录》所言：回忆“不相干的事”最是生趣盎然，家史不妨与“街谈巷议”等量齐观，国事往往与“道听途说”真假莫辨，到头来都成了“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的小道八卦或轶闻逸话。唯有扮演自我生命的“易容师”，将小我私史与人际关系撷长掐短、变形整容、排列组合，最后更效巫师算命卜筮行径，以不同的语言符号自行翻译或演绎命运的多重变奏，方能在天灾人祸频仍的世界里觅得一息生机。

就如琵琶在战火延烧的宿舍楼梯上一堆没人清理的弃置书籍中挖宝：

多半是教科书，有中文的，《孔子》、《老子》、《孟子》。她想找《易经》，据说是公元前十二世纪周文王所作，当时他囚于羑里，已是垂垂老矣，自信不久便会遭纣王毒手。这是一本哲学书，论阴阳、明暗、男女，彼此间的消长兴衰，以八卦来卜算运势，刻之于龟甲烧灼之。她还没读过，五经里属《易经》最幽秘玄奥，学校也不教，因为晦涩难懂，也因为提到性。《老子》也不在她的课外书之列，只读过引文，终于让她找着了一本。

《老子》是乱世的贤哲，而中国历史上总是乱世多于治世。<sup>⑰</sup>

既然“乱世多于治世”，那就世故地看待世变吧！女子在兵燹废墟中持着道家经典《老子》一书的形象剪影，仿佛让我们看见张爱玲中晚年在不断重复书写个人生命史的自我疗愈或自我耽溺的过程中，终于寻得乱世中安身立命之“道”……

## 五 结语

“一阴一阳之谓道”，阳刚之“大我”历史叙述如王韬的香港报纸政论，阴柔之“小我”琐屑全与历史“不相干”，仅得其一面皆为片面。幸而王韬的上海才子底色时时笔涉“不相干”，他的东瀛之旅也不无琐屑，甚而不乏香艳行径，常引发卫道人士的批评；张爱玲笔下的杨露 / 蕊秋更应视为一个大叙述，中国近

现代文化转型中一个卓绝漂泊的新女性曲折经历自有其代表性意义，即使她最终蜕化到寄生的境地中去了，仿若又是一个“五四遗事”故事。王韬抑或张爱玲，并不是造化定型，他们都是“易”的产物。

不容夸张他们二人的笔下能够经天纬地，但至不济也是其自家的《易经》。王韬式的历史观与叙述代不乏人，张爱玲成了当代文学家的祖师奶奶，却找不到一个酷肖子孙。

我的以香港为证的文化地理与历史书写不同时间段的并置，是大叙述，还是“不相干”，更或是展示“易”象？说不出为何卦象，就算是一点学术的“生趣”也好！

注释：

- ①⑦ (清)王韬《变法·中》：“《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知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也。”见《强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尚简》一文曰：“《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非今日之急务哉？”（同上，第40页）《答强弱论》一文曰：“《易》曰：‘穷则变，变则通。’此君子所以自强不息也。”（同上，第167页）另，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报名“循环”亦有“天道循环，自强不息”之意。
- ② “海上”一词，晚清上海文化圈中别称本地之语汇。本文“海上”概念扩展国际舟楫交通，更有意识观念遥通泰西、东瀛之义。
- ③④ (清)王韬：《漫游随录图记》，王稼句点校，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41、211页。
- ⑤ 王韬：《悔余漫录》，《王韬日记》，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97页。
- ⑥ 参见《王韬与近代世界》，香港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13-336页。
- ⑧ 王韬曾在《记香港总督燕制军东游》一文提及此事。同注1，第243-244页。
- ⑨⑩ 宋以朗：《雷峰塔 / 易经 引言》，见《易经》，张爱玲著，赵不慧译，皇冠出版社2010年版，第5、289页。
- ⑩ 该文先是发表于1944年《天地》月刊第五期，后收入张爱玲的散文集《流言》。
- ⑪ 张爱玲：《烬余录》，见《流言》，皇冠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页。
- ⑫ 此文曾日译刊载于《大陆新报》。许季木：《评张爱玲的〈流言〉》，见《张爱玲的风气——1949年前张爱玲评说》，陈子善编，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82页。
- ⑬ 周瘦鹃：《写在紫罗兰前头（二则）》，同上注，第63-65页。
- ⑭ 李欧梵：《香港，作为上海的“她者”》，《读书》1998年第12期。
- ⑮ 张爱玲：《红楼梦魔》，皇冠出版社1987年版，第254-255页。相关论述参见拙作《五讲红楼梦，三弄上海上花？——张爱玲与中国言情文学系谱的断裂与重构》，《华文文学》总第102期，2011年1月。
- ⑯ 王德威《张爱玲再生缘——重复、回旋与衍生的叙事学》《雷峰塔下的张爱玲》、苏伟贞《连环套：张爱玲的出版美学演绎：以1995年后出土著作为文本》可视为例外。

[ 吕文翠 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 ]